



重庆文史资料

1978—198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97.13

636

重庆文史资料

1976--198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重庆

重 庆 文 史 资 料

1978—198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准印证：重庆字第 106 号)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0.50元

重慶文史資料創刊十周年

高舉愛國主義旗幟
為社會主義精神文
明建設服務

楊成武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编辑说明

重庆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从一九七八年恢复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

十年来，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全国政协、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指导，中共重庆市委的关怀，重庆市政协的领导，各民主党派和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坚持爱国主义方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重庆地区的实际出发，编辑出版《重庆文史资料》三十辑，文史专书二十五种（二十八本），合计一千二百万字，发行五十万册。这些书刊，有的获得四川省、重庆市人民政府分别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为许多学术专著、文艺作品广泛采用；有的被国家列为对外文化交流的学术著作，受到我国台湾、香港，以及美国、日本、加拿大、法国、东德、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学者的重视，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历史、中华民国史，特别是重庆地方史，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作出了一定贡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和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为了回顾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特将有关领导同志、专家学者为这些书刊撰写的序言、评论，《重庆文史资料》第一辑至第三十辑目录索引，二十五种文史专书的内容简介，汇编成册，以供参考。

编者 一九八八年四月

目 录

编辑说明 (卷首)

· 序评辑存 ·

《杨闇公日记》序言 任白戈 (1)

《重庆谈判纪实》序言 王炳南 (9)

《重庆谈判纪实》读后 余湛邦 (10)

以史为镜

——读《重庆谈判纪实》 何鸿钧 (14)

《国民参政会纪实》序 许德珩 (17)

历史的足迹

——推荐《国民参政会纪实》 何鸿钧 (19)

历史的纪实和教训 万点馆主 (22)

国共合作的史证

——《国民参政会纪实》读后 朱荣福 (25)

《马寅初评官僚资本》序言

——介绍一位渊博的学者和民主革命的战斗

马寅初老先生 许涤新 (27)

《〈屈原〉研究》序言

——永远闪光的雷电 陈荒煤 (32)

《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评介·····	胡昭曦(37)
《邹容文集》评介 ·····	李润苍(42)
《辛亥革命重庆纪事》序言·····	隗藏涛(44)
《辛亥革命重庆纪事》的特点·····	段 渝(48)
《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序言 ·····	汤象龙(50)

· 专书简介 ·

重庆简史和沿革·····	(55)
巴蜀史稿·····	(55)
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	(56)
大西农民军五次攻克重庆始末·····	(56)
重庆开埠史·····	(57)
近代川江航运简史·····	(57)
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	(58)
邹容文集·····	(58)
论邹容·····	(59)
辛亥革命重庆纪事·····	(59)
重庆蜀军政府资料选编·····	(60)
重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集刊·····	(60)
重庆“三·三一”惨案纪事·····	(61)
杨闇公日记·····	(61)
忆杨闇公同志·····	(62)
大西南的抗日救亡运动·····	(62)
重庆抗战纪事·····	(63)
重庆抗战纪事·续编·····	(63)

国民参政会纪实·····	(64)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	(64)
马寅初评官僚资本·····	(65)
《屈原》研究·····	(65)
重庆谈判纪实·····	(66)
《沁园春·雪》考证·····	(66)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	(67)

· 目录索引 ·

《重庆文史资料》第一辑至第三十辑 ·····	(68)
------------------------	--------

《杨闇公日记》序言

任 白 戈

读了杨闇公同志的日记，不禁感慨万端，哀思难忘。他一生为革命的崇高品质，溢于日记的字里行间，感人至深，令人肃然起敬，衷心景仰。

杨闇公同志，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人。是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组织的建设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地方委员会（以后称省委）书记，中共四川军委书记。他是在一九二七年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后，被伪装拥护革命，打出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旗号的反动军阀刘湘、王陵基、蓝文彬之流，按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计划逮捕杀害的。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闇公同志早年参加革命。他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改变旧中国的面貌，找寻革命真理，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成为四川党早期的优秀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同吴玉章同志一起，深入群众，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党的组织，培养革命干部，组建了四川全省党的统一组织，广泛地在全省各地开展工农运动和学生、妇女运动，并同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一起，开展军事斗争，组织武装起义。同时，他领导了四川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壮大了国民党左派队伍，打击了右

派，利用军阀内部矛盾，迫使他们不致于公开反对国民革命，暂时保持观望态度，减少革命阻力，解除了四川军阀东下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危害，并从多种途径团结各方面的革命力量，掀起国民革命的高潮，援助了北伐战争。他的功绩不但应当载入四川党的史册，而且应当在我党历史上占有相应的篇章。

闾公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但他所留下的日记，则永远是我们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这本日记，记载了他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的革命活动。当时由于他身负重任，工作繁忙，以至日记时有中断。除一九二四年记的是全年外，一九二五年仅记至三月十七日即中断。一九二六年则只记到元月二十五日，这恰是他在广州开国民党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期。就在这一年元月一日的日记中明明记着：“去年的今日，在渝中作局部工作的奋斗，已觉有应付不暇的样子，今年竟负了十百倍于去年的国民革命的整个的重，……只有拚命的努力，以求尽我应尽的职责！”因为此后吴玉章同志即留在国民党中央工作，四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领导工作，都交给闾公同志负担。这部日记虽然记的日子不多，但却真实地反映了烈士的革命斗争生活，纪录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四川党早期的组织活动情况。它不但对研究四川党的建立、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料，而且对我们整个中共党史的研究，也有很大的价值。同时这本日记也是宣传、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激励人们继承先烈遗志，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的好教材。读者从日记中必将得到很多教益。

闾公同志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他早在青少年时代，便能以清醒的、敢于正视现实的头脑和敏锐的政治眼光去观察国家大事。他看到了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帝国主义侵略者在

我国横行无忌的情况，对于这种腐朽、黑暗的政治局面，极为不满，从此便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多方寻求，摸索革命的真理和解救祖国的道路。

为了“进新学、增知识、广见闻”，他毅然挣脱了封建族长的种种束缚，远到南京和日本学习军事，参加了一系列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的斗争，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运动。当时，由于还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所以，他参加的革命斗争都没获得胜利。一九一九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推动了我国知识界的觉醒，一些先进分子认识到，要解救苦难深重的中国，只有走俄国的道路。闾公同志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日本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奋不顾身地参加了支援国内“五四”运动的斗争。这时，他已开始从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了。在一九二四年元月一日的日记中，他写到：“这一般幸运儿的伟人们（指借辛亥革命爬上政治舞台，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妥协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足足闹了十二年，仍然是没有具体的办法……吾国自辛亥改革后，算是骤进共和，民人的程度实与共和相去很远，兼辛亥以前的旧有势力者并未打倒，所以才有这十二年的纷扰。”又说：“现在训练出来的后进者及……家，很不乏人，我怎么不乐观！”这里表达了他对旧民主主义的批判，和对革命未来充满信心。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闾公同志在政治上逐渐成熟。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八日的日记中叙述了他“内心有一种起伏不定的问题，欲指导群众，究竟从那条道路走的好？并思及目前的环境，究竟应取种什么方法才打得破？”他承认“象这几种问题，萦绕我心久矣！前者刻已认定马氏为主（即马克思的革命学说），独后者很难得适当的方法。”这时，闾公同志虽然已

和吴玉章同志等在成都组织了青年共产主义（简称YC）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但由于当时四川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不知道党的革命纲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他仅认定要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而还不知如何走法。及到是年六月，阎公同志从成都到上海会见恽代英等党员，受到党的教育。在日记中他以敬佩的笔调称赞恽代英同志“谈话很有一部份真理存在。他研究的方法都是从实际入手，不是象他们光唱高调，漠视一切，故我很有动于中。他非常注重向民间去的工作，与我所主张的很相同。”又说：“代英对于现社会的情形，一定了解无余，故很重视行动的工作。”他在返川的轮船上又读了《唯物史观》等书籍，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这样，他在思想上发生了一个飞跃。回到重庆，他筹建了党的地方组织，深入开展各种群众运动，由于他能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实践，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所以终于锻炼成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出色的领导人。这就是杨阎公同志所走过的革命道路。过去一般的革命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亦大体与此相同。这里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一个人革命不革命，要走什么道路，并不取决于他的家庭环境和出身成份，而在他有没有为国为民牺牲的大志，和孜孜不倦探求革命真理，勇于革命实践，把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求实精神。这对每个有志于革命的青年，特别是出身于剥削家庭的知识分子都具有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

阎公同志具有一心为革命，公而忘私，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他早年参加革命，到加入共产党以前，作为一个革命者，他了解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身于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斗争，曾经多次遇险和被拘捕，都没能丝毫动摇其坚定的革命意志。他一九二四年说：“十

余年来出生入死者四次。”他真是一心扑在革命上竟忘了个人的一切。这种可贵的革命精神，在閻公同志的日记中处处皆是，跃然纸上。他为宣传马列，讲解主义真谛，不辞辛劳，深入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以至置个人身体健康于不顾。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川东师范学校邀请他去讲演，事后他写到，“连夜不眠，疲乏到极点了……。辞不获已，只得强力支持去说说，把讲题说了一半。精神已来不及了，声气也嘶了……那可爱的青年们，只准我休息三十分钟，无论如何要我讲完……无法，只得再说下去。”又一次，他上午带病工作，当晚写道：“午后许多同志来寓，请示办法，与他们谈至八时许。他们去后……诸妹的同学们（八人）因在寓留宿，要我为渠等谈目前思潮的变态和应走的路，强应其请，与之一谈。……不觉谈至一点。……一时三十分才睡，浑身寒气已遍，咳得非常的厉害，加以头也有些作痛。”閻公同志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心献身革命的共产主义崇高品德，是一切革命者的楷模。

閻公同志的知人之明和对同志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也是非常突出的。大革命时期，閻公同志作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四川的共同领导人，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他能知人善任，团结同志，组织革命队伍，壮大革命力量，克敌制胜，发展革命大好形势，这充分表现他作为革命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成熟。他与刘伯承同志的相知和给予的评价，便可清楚看出来。一九二三年，閻公同志在成都与伯承同志相识。次年，他在日记中记着与伯承同志谈入团事，说：“他的答复，最足使人起敬：‘见旗帜就拜到，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相谈之下，閻公同志赞不绝口，说：“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

高出万万倍。”又说：“此后，拟设法使其从本方向走，若能达目的，又多一臂助。”当他记到刘伯承同志要赴键为县，他送行出成都南门，至武侯祠，又写道：“如象伯承这样的人，实不可多得的了。……伯承去后，我觉有依依不舍的情境，他送了我一张像片，当珍藏之。”他对伯承同志十分敬佩，成为至交。经他介绍，伯承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冬天，他与伯承同志在四川军阀部队中发动领导了顺（庆）泸（州）起义，震慑了四川军阀，纷纷易帜，表示拥护国民革命，解除了他们东下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威胁，对巩固当时国民革命的大好形势，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一些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人，更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他这一突出的高贵品质。他对同志的爱护和关怀常常比对他自己的亲兄弟还要深切，所以他能把四川党组织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在大革命时期，领导群众，战胜了国民党右派和军阀反动势力，革命获得节节胜利。

阆公同志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亦值得一切革命者很好的学习。他经常穿着一身褪色的旧西装，领带都是黑色的，生活很简朴，但他对群众的生活疾苦却特别关心，比自己为重。他经常利用开会、走访等多种形式，调查民情，了解各阶层群众的思想动向。群众都很尊敬他，亲近他，愿意把心里的话向他说。一九二四年夏天，他从上海返渝途中，除勤奋攻读革命著作，接触船上各方面的人作社会调查外，为了解农村的现状，他利用轮船停泊的时间，多次上岸与江边农民交谈，很受启发。他为农民的“亲切和友爱”、“诚实”、“纯朴真诚”所感动，又深为农民生活“实在太苦”，“比社会上最苦的还要可怜”，而激起他“为人流血的雄心”，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这种与群众血肉相联，生死与共的无产阶级感情，在他的日记中，还多次

表露出来。陶公同志由于经常生活在群众之中，一刻不脱离群众，所以他对党内的思想政治情况和群众心里想的问题都了解得很清楚。他和同志谈话或对群众作宣传，就能有的放矢，言之有物，较好地收到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作用。要问陶公同志在大革命时期之所以能领导为数还不很多的党、团员战胜貌似强大的敌人，在四川掀起了国民革命高潮的根本原因何在，就在他身体力行贯彻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动员和组织群众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这就是克敌制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更值得称道的是陶公同志的革命的恋爱观，堪为青年的表率。在一九二四年的日记中，他说：“婚姻是个人一生的幸福，事业是群众的幸福，两者相权，只有牺牲个人为群众。”又说：“故此次婚事，也只好依着这样方式去罢了。如来者能志同道合，爱情上自然是有增无减。”一九二五年，陶公同志在给赵宗楷同志（陶公同志的夫人，当时正在相爱）的信上“劝其作社会主义的研究”，并“拟先送点初步的书与她看，将来如能够彻底的觉悟，则吾党又多一个健者。”短短数语，道出了一个革命者在对待爱情上，首先是要求彼此应是政治上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志同道合的同志，而不是其它，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境界啊！还要提到的是陶公同志自幼抱给他二叔，当接到家书要他继承遗产时，他说：“区区遗产，何能堕我初志哟！”发誓“宁饿死也不受遗产”。在旧社会，拒绝继承遗产，同传统的观念实行决裂，这在当时确是一种彻底革命思想的表现。

陶公同志短短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崇高品质与优良作风，将与日月同辉，与山河长在。当我们翻开这本日记的时候，看到他那光辉的思想与不朽的革命实践，一定会使我们进一步振

奋革命精神，一定会激励我们在新长征中，更加勇往直前，踏实、坚定。

这里还要向读者着重说明，杨闇公同志的夫人赵宗楷同志为保存这本日记，曾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监视、搜查作了二十多年的斗争，付出过不少心血，才把这本日记完好地保存下来。解放后，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曾在报刊上登载过日记的片断。原重庆人民出版社也曾编印过日记的试排本。“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影响下，日记的部分篇页被破坏。现在《杨闇公日记》得以正式出版，应该感谢赵宗楷同志保存历史文献所作的贡献；更应该感谢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才得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使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宝贵遗产能够重见天日，为鼓舞后代去进行新的长征而永远放射出不灭的光芒！

《重庆谈判纪实》序言

王 炳 南

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同志诞生九十周年。为了缅怀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丰功伟绩，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同志编辑整理了《重庆谈判纪实》，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这是值得称赞和非常有意义的事。本书以大量珍贵的照片，丰富而且比较完整的资料，再现了当时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这一历史事件。这对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有相当参考价值；为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胆略和英勇气概，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教材。

我祝贺这本书的出版。

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